

本书10次重印，累计印数10余万册，广受读者欢迎



王启兴 毛治中 评注

唐诗三百首 评注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王启兴 毛治中 评注

唐诗三百首 评注

TangShiSanBaiShouPingZhu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诗三百首评注

王启兴 毛治中 评注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 430070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数: 385 千字
版次: 2007 年 8 月第 2 版
印数: 123 331 - 129 330
书号: ISBN 7 - 216 - 01333 - 6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 17.375
插页: 1
印次: 2007 年 8 月第 10 次印刷
定价: 26.00 元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修 订 前 言

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是清人孙洙和他的继室徐兰英合编的一个唐诗选本。

孙洙，字临西，号蘅塘退士，江苏无锡人。他生于康熙五十年(1711)，卒于乾隆四十三年(1778)。他在乾隆十六年(1751)进士及第，后相继担任过大城、卢龙、邹平等县的知县和江宁府教授。孙洙诗学杜甫，著有《蘅塘漫稿》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(1763)，所定书名及所收诗篇数量(选唐代七十七位诗人三百一十首诗)，似有意仿《诗三百》，也可能是受了谚语“熟读唐诗三百首”云云的启发。该书面世后，为之作注、增评者甚多，著名的有上元女学者陈婉俊(有道光餐花阁刻本《唐诗三百首补注》)。陈氏之外，章燮的《唐诗三百诗注疏》，在道光、咸丰、光绪年间也有多种刻本。光绪十一年(1885)，四藤印社重刻此书，特将杜甫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中原书未收之另外三首增入，以得组诗之全。这样，按诗篇数量来分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版本，便有三首一百一十首与三百一十三首的区别。至于于庆元编的《唐诗三百首续选》(有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希文堂刻本和十七年粤东集益堂校刻本)，在孙、徐选本基础上补录五十三家诗三百二十首，与原选本出入太大，是不能纳入《唐诗三百首》版本系列的。

从孙洙《序》文可知，他编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目的有二：一是用它取代《千家诗》，编出一种好的“家塾课本”；一是为成人、特别是诗歌写作者提供一种鉴赏唐诗、学习唐诗创作艺术经验的读本。可以说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种种特点，包括所选诗篇的内容、数量、体裁、风格取向以及编排体例，都是由其编写目的决定的。

从前者可以看出孙洙对《千家诗》的评价和取舍态度。《千家诗》是康熙以来十分流行的村塾课本，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合称“三、百、千、千”，都是儿童就学必用的启蒙教材。《千家诗》选124位诗人的223首近体诗(七言律、绝和五言律、绝)，诗人绝大



多数生活在唐五代及两宋时期(有两人出自明代)。所选诗多为语言浅近、明朗,诗风清丽、俊爽,易道易晓易读易记之作,加上四类诗均从题材着眼、以春夏秋冬时令为序排列,所以用它作教材,十分便于蒙馆教学。孙洙对《千家诗》有三点不满意,一是所选诗并非全是精品,所谓“其诗随手掇拾,工拙莫辨”;二是所选诗体太少,所谓“止五、七律、绝二体”;三是以春夏秋冬为序排列诗篇,一时唐人之作,一时宋人之作,乱了体制,所谓“唐宋人杂出其间,殊乖体制”。平心而论,这三点未必就是《千家诗》的短处。孙洙这样说自有其道理,至少表明他编《唐诗三百首》,会有针对性地克服《千家诗》的种种弊端,要后来居上,取而代之。即他说的:“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,每体得数十首,共三百余首,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,俾童而习之,白首亦莫能废。较《千家诗》不远胜耶?”不过,这段《序》文也告诉我们,他编《唐诗三百首》,虽然专选唐代之诗,把诗体由五、七言近体诗扩大到五、七言古体诗和乐府诗,各种诗体的诗均按诗人出生先后为序排列,与《千家诗》大为不同,但对《千家诗》选诗数量适中的做法和“取其易于成诵”之作的原则,是持肯定态度并在编写中取而用之的。

后者则涉及对《唐诗三百首》选本性质的定位问题。古人编诗歌选本,总有自己的动机,或借以阻遏一种诗歌思潮,或用来提倡一种诗风,或提供一种诗歌鉴赏读物,或为诗歌写作者提供揣摩诗歌艺术的样品,或编出一本学诗用的教材,或为了编选而编选。前已言及,孙洙编《唐诗三百首》,实有取代《千家诗》之意,当然将该书编成“儿童就学”时的“家塾课本”,是他的第一要求。要指出的是,他并未将“为家塾课本”当做编写该书的惟一要求。还提出了“俾童而习之,白首亦莫能废”的要求,并认为这应是该书“远胜”于《千家诗》的地方。所谓“白首亦莫能废”,是说人老了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还觉得它极具艺术魅力,可读性很强。这一点充分说明,孙洙编《唐诗三



百首》，不但把少儿读者作为接受对象，而且把“白首”读者即成年读者也作为接受对象。同时，他还自信地说：“‘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’请以是编验之。”原来，将该书编成诗歌写作者学习唐诗艺术经验、指导诗歌创作的教科书，也是孙洙编唐诗选本的一大要求。这样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作为唐诗选本的性质，就不单单取决于“家塾课本”的特性，还取决于它作为适合成年读者欣赏唐诗的文学读本的特点，以及作为便于诗歌写作者广泛吸收唐诗艺术经验、用于指导诗歌创作的教科书的特点。于是，我们看到，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之诗，多为唐代诗人中大家、名家之作，像孟浩然（15首）、王维（29首）、李白（29首）、杜甫（39首）、韦应物（12首）、刘长卿（11首）、杜牧（10首）、李商隐（24首）八人入选的诗多在十首以上，总数（169）远远超过全书诗篇半数。其他69位诗人的作品，至少百分之七十可以称得上是唐诗中的精华。可以说，唐诗中多种题材、多种体裁、多种风格和重要流派、著名诗人的代表作，多数都被收到了这个选本中。

正因为它选诗力求精美，能适应各个层面读者的需要，故问世以后，“风行海内，几至家置一编”（四藤印社主人语）。直到今天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作为教材和文学读物的功能也还没有消失。君不见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不但一些年迈的爷爷、奶奶和年轻的爸爸、妈妈在用《唐诗三百首》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子孙们念唐诗，就连高校中文系的学生，学唐代文学史，也在把它当作品选使用。两百年前的“家塾课本”现在还能作高校教材，其生命力可谓强矣！至于在商业文化无孔不入、人们渴望宏扬优秀传统文化、继承中华民族先进的人文精神，以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，说它能起到优秀古典文学读本的作用，应属情理中事。如若不信，试请读者诸君，在饱听履观专家神侃《史》、《汉》、水煮《三国》、戏说乾隆、探秘《红楼》之余，再读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去听听“初唐四杰”的青春之歌，去看看开、天诗人



眼中的盛唐气象，去体味老杜的沉郁顿挫，去感受“小李”（李商隐）的深情绵邈。或同孟浩然去度过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仲夏之夜，或随崔颢登上黄鹤楼去眺望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或陪王昌龄去踏访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的古道，或跟岑参去欣赏北庭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雪景。既可体验韦应物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的心境，也能想像高适目睹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的义愤。要不就和李白同饮那已成千年陈酿的“花间一壶酒”，或同韩愈到深山古寺前领略雨后“芭蕉叶大支子肥”的清新。如此诵读唐诗、涵咏唐诗，一定会有净化心灵、陶冶情操、充实精神生活、提高人文素养和审美境界的作用。至于因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而诗艺大进，更是不少现代诗人成功的不传之秘。

王启兴、毛治中两位教授撰写的《唐诗三百首评注》，初版于1984年，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在问世后的头十年就印了七次。《评注》的成功，得益于两位教授学风的严谨和工作态度的认真。对这一点，我有很深的体会，因为我与两位先生有过两次编撰、注解古代诗歌选本的经历。一次是与两位先生（还有胡国瑞、蔡守湘等先生）在1975—1979年编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，几年前印数已超过110万本）。在《新选》选篇之前，王、毛二先生就和大家一道深入研究过孙洙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长短之处。另一次是与两位先生在1980—1981年作《千家诗新注》（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）。两次共事，我都曾为两位先生注诗、解诗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动。这几天，我又把《唐诗三百首评注》读了一遍，深感二位先生作评注，和他们编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、作《千家诗新注》一样，都是一注一评，求真尚美。由于《评注》后出，因而该书的长处较前者更为突出。观其注，不但能扫除读者读诗的拦路虎，还能向读者介绍些许文化知识和学



术见解；读其评，常有读诗歌赏析文章的感觉，因为大都能说出诗人创作的艺术匠心。精评细注，说得到位，应是《唐诗三百首评注》在同类读物中更受读者欢迎的一大原因。

由于毛治中先生已经过世，王启兴先生因患眼疾难以读写，所以这次对《唐诗三百首评注》的修订，由出版社组织力量完成。王先生要我写几句话充作《评注》的修订版前言，于是便有了上面的散语卮言。说得不对的，还望王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教。

熊礼汇

二〇〇六年八月四日

于武昌南湖山庄梅荷苑

前 言

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极为辉煌灿烂的时代,唐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,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座艺术宝库。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期,诗人辈出,群星灿烂,涌现出一批在诗歌创作上有卓越成就、举世闻名的大诗人。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,培育和开拓这一诗歌园地,出现了百花竞放、万紫千红、美不胜收、蔚为大观的空前繁荣景象。明代的诗论家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说:

甚矣,诗之盛于唐矣!其体,则三、四、五言,六、七杂言,乐府歌行、近体、绝句,靡弗备也。其格,则高卑、远近、浓淡、深浅、巨细、精粗、巧拙、强弱,靡弗具矣。其调,则飘逸、浑雄、沉深、博大、绮丽、幽闲、新奇、猥琐,靡弗诣矣。其人,则帝王、将相、朝士、布衣、童子、妇人、缁流、羽客,靡弗预矣。

这一段话,虽有不足之处,但扼要而概括地论述了唐代诗坛的盛况。清代康熙时所编的《全唐诗》九百卷,录诗人两千二百余人,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,散佚的无法计算。从现存的这些诗篇来看,题材多样,内容丰富。大者如时代风云变幻,人民疾苦,阶级对立,民族矛盾;小者如士卒征戍,边塞风光,贬谪怨愤,羁旅行役,朋友赠别,爱情闺怨,描摹自然等等无不入诗。诗人们笔笼万端,状物图貌,抒情写怀,各尽其妙,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,给人们以历史的借鉴和美的享受。

就体裁而言,在六朝诗人分辨四声,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讲求音节和谐的基础上,初唐“四杰”(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)继承和总结前人在声律方面的成就,注意诗歌韵律之美,确立了五言律诗的体式。其后,经过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杜审言等诗人不断的实践和创造,五言律诗日趋成熟,七言律诗的体式也确定下来,五、七言绝句也有所发展。这样,就把古典格律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所以高棅在《唐诗品汇》中称沈佺期、宋之问的近体诗为“沈、宋之新声”。



胡应麟也说：“唐初无七言律，五言亦未超然。二体之妙，杜审言实为首倡。”（《诗薮》）此外，乐府古题、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，也都不断创新而向前发展。到了盛唐，众体皆备，大放异彩，永为模式。

从诗歌风格来看，“四杰”“词旨华靡”，还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。陈子昂古雅道劲，“追建安之风骨，变齐梁之绮靡”（《唐诗别裁集》）。沈佺期、宋之问工丽浮靡，“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”（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）。杜审言“浑厚有余”，较少浮靡之气。张九龄“雅正冲淡”，刚健苍凉。孟浩然淡远恬静。王维幽闲淡泊，诗中有画。王昌龄流利婉转，含蓄有致。李白飘逸豪放，雄伟壮阔。杜甫沉郁顿挫，工致委婉。高适、岑参慷慨雄浑，悲壮激荡。韩愈、孟郊奇崛险怪，硬语盘空。白居易、元稹通脱坦易，明白浅近。刘禹锡、柳宗元清丽健峭，情味深长。李贺奇瑰警迈，出人意表。李商隐深曲艳丽，“俚偶繁缛”。杜牧豪纵雄健，流情感慨。……诗人们各有其独特风貌，在艺术上也各有创造，真是众采纷呈，琳琅满目。

唐代诗歌这种空前繁荣的景象，无论是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；无论是体裁的完备，还是题材的多样化；无论是艺术上的创新，还是意境的深隽；无论是韵律的精严，还是诗歌语言的锤炼，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：“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，大可不必动手。”（一九三四年《致杨霁云》信）这当然不是说宋、元、明、清便没有好诗了，但就唐诗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来说，无疑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。

唐诗的思想内容既是这样精深博大，丰富多彩；艺术形象又是那样瑰丽奇伟，千姿百态，自然为人们所喜爱而广泛传诵。但一般人不可能去通读全部唐诗，只能通过读选本“尝鼎一脔”，欣赏各家脍炙人口的名篇，于是根据编选者的美学观和艺术标准而选的唐诗选本就逐渐出现。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唐诗还在发展之时，殷璠



就选了孟浩然、王昌龄、李白、李颀、王维等二十四人的诗二百三十四首。唐肃宗时，元结选了沈千运、王季友、孟云卿等七人的诗作二十四首。以后，芮挺章、令狐楚、高仲武、姚合、韦庄、韦毅等人的唐诗选本，也陆续出现，后汇集为《唐人选唐诗》十种。但这十种唐诗选本在当时和后代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。这是因为一些诗人的名作，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还没有为编选者所认识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杜甫的作品，九种选本都没有选，只有晚唐韦庄的《又玄集》里，选了五首五言律诗，两首七言律诗，而五、七言古诗和五、七言绝句一首也没有选。宋代王安石的《唐百家诗选》，选诗一千二百六十四首，但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韦应物、元稹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篇皆不入选。所以，这个选本流传不广，影响也不大。宋代以后的唐诗选本，如金代元好问的《唐诗鼓吹》、元代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（兼选宋诗）、明代高棅的《唐诗品汇》和钟惺、谭元春的《唐诗归》，清初王渔洋的《唐贤三昧集》、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等等，虽然编选者不乏名家，但都没有“风行海内”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纪晓岚在《御选唐诗》的提要里，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，他说：“元结尚古淡，《箴中集》所录皆古淡；令狐楚尚富赡，《御览诗》所录皆富赡；方回尚生拗，《瀛奎律髓》所录即多生拗之篇；元好问尚高华，《唐诗鼓吹》所录即多高华之制。盖求诗于唐，如求材于山海，随皆取给，而所取之当否，则如影随形，各有其人之学识。自明以来，诗派屡变，论唐诗者亦屡变，各持偏见，未协中声。”

纪晓岚指出选诗偏于一隅，只选一种风格的诗，当然局限性很大，而不可能选入广泛传诵的名作，这样的选本根本不能反映出唐诗多方面的突出成就。明代到清初的几种唐诗选本，虽有可取之处，但因选者标举某种艺术观，或对唐诗的发展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，所以也难免有囿于偏见、不能持平之弊。如高棅的《唐诗品汇》，特别推重盛唐诗歌，把盛唐诗分为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，称初唐诗



为正始，中唐诗为接武，晚唐诗为正变、余响。这样划分，突出盛唐而忽视中、晚唐诗在唐诗发展中的成就和重要地位，就给以后一些诗论家的“诗必盛唐”的主张提供根据，从而贬抑初唐和中、晚唐诗。竟陵派的钟惺、谭元春选《唐诗归》，企图纠正李梦阳、何景明等人学盛唐诗只袭其貌而遗其神，有流于肤廓之弊，但又偏于幽僻奇诡。清初的王渔洋选《唐贤三昧集》，以神韵为宗，主张诗歌以冲淡清远、含蓄不尽为佳，不选李白、杜甫的诗篇而突出王维。这样的选本片面性更大，既不能反映唐诗的成就，又不能使读者欣赏一些著名诗人的佳作名篇。康熙时沈德潜选《唐诗别裁集》，不同意高棅“正变盛衰”之说，主张“大家名家而外，即旁蹊曲径，亦各有精神面目”都可入选，因而所选诗面较广。但他强调“编者之责，能去郑存雅”，不能“使人去雅而群趋乎郑”（《唐诗别裁集序》）。所谓“去郑存雅”，就是不选那些不合“温柔敦厚”之旨，浮靡浅露之作，只选雅音。所以，康熙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刊行的初选本中，“四杰”的歌行不选，白居易的讽谕诗，张籍、王建的乐府诗也不选，李贺的诗和李商隐的无题诗也不选。到乾隆二十八年（一七六三）刊行的重订本中，才有所增补，但还是不选李商隐的无题诗，大概认为无题诗浮艳不雅。选诗一千九百二十八首，有二十卷之多的《唐诗别裁集》，选者又是清初著名的选诗家和诗论家，然而此书也没有“风行海内”。

唐诗选本“风行海内，几至家置一编”（四藤吟社主人语，见文学古籍刊行社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）的，当推乾隆二十九年（一七六四）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这一选本，两百多年来不断翻刻、印行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其影响之大，流传之广，是上述各种唐诗选本望尘莫及的。孙洙既不是名诗人、名选家，也不是著名的诗论家，为什么《唐诗三百首》成为家传户诵的书呢？这是因为它存在一些显著的优点。

首先，孙洙不是只崇尚、推重某种风格的诗人的作品，也不是为



评价唐诗的发展流变而选唐诗，更不是为了标举某种艺术观来选唐诗。他是为“世俗儿童就学”而编“家塾课本”才选唐诗的。目的既不相同，又没有固定的成见，这样就能选入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的作品，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唐诗选本相比较，显得丰富多彩。就作者来说，有七十七人，从皇帝(唐玄宗)到僧侣、歌女、无名氏都有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其次，所选的作品大都明白易解，又多脍炙人口之作，这就易于为群众接受，引起他们阅读、欣赏的兴趣。如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，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，杜审言的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，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，杜甫的《望岳》，王维的《终南山》，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杜牧的《泊秦淮》，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，等等，都是千百年来人们众口交誉的佳作。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：“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，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，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。”人们“吟咏欣赏，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”(《〈唐诗三百首〉指导大概》)。

再次，诗体较为完备。孙洙鉴于《千家诗》“止五、七律、绝二体”，“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，择其尤要者，每体得数十首，共三百余首”(孙洙原序)。其中孙洙承袭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的观点，另立“乐府”一项，也与诸家选本有异。当然，孙洙没有选五、七言排律，似乎是美中不足。不过，作为“家塾课本”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不选排律，也并非其短。就各体诗所选的数量来看，比较适中，反映了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各体诗的发展情况。据“四藤吟社”刊本，所选诗篇计五言古诗三十三首，乐府七首；七言古诗二十八首，乐府十四首；五言律诗八十首；七言律诗五十一首；五言绝句二十九首，乐府八首；七言绝句五十一首，乐府九首，其中五言律诗比七言律诗多，七言绝句比五言绝句多，这并不是孙洙的偏好，而是从唐代各体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着眼。施子愉先生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《东方杂



志》第四十卷第八号上,曾发表《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》一文,对《全唐诗》中录诗一卷以上诗人的各体诗进行统计如下:

数 目 时 期 体 裁	初 唐	盛 唐	中 唐	晚 唐
五 言 古 诗	663	1795	2447	561
七 言 古 诗	58	521	1006	193
五 言 律 诗	823	1651	3233	3864
七 言 律 诗	72	300	1848	3683
五 言 排 律	188	329	807	610
七 言 排 律		8	36	26
五 言 绝 句	172	279	1015	674
七 言 绝 句	77	472	2930	3591

施先生的统计数字,虽只是从存诗一卷以上诗人的作品中得来,但很能说明唐代各种体裁诗歌的发展情况,也能证明孙洙在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所选各体诗的数量是适中的,大体反映了唐代各体诗发展的实际。

第四,题材较为广泛、匀称,而少单调琐屑之弊。在入选的诗篇中,有的反映时代动乱,人民贫困(这方面入选的作品不多,仅元结的《贼退示官吏》,后面再谈);有的抒发怀才见弃,抱负不能施展的愤懑;有的抒写不愿同流合污,坚持高尚操守的情怀;有的描写悠游山林,欣赏自然美景;有的反映征戍士卒之苦和描绘边塞风光;有的是感时伤怀,慨叹飘零;有的是表现羁留异地,深切怀乡;有的是描写宫怨、闺愁;有的是朋友酬答;有的是题画和描写音乐,等等。这些也是“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”(朱自清《〈唐诗三百首〉指导人概》)。

第五,入选的诗人,突出大家、名家,兼及在唐诗发展中有一定



影响的诗人。这样，重点突出，主次分明；同时并不是特别推重盛唐而忽视初唐、中唐、晚唐。在七十七个作者中，初唐八人，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各二十多人。入选诗在十首以上的有八人。盛唐时的孟浩然十五首，王维二十九首，李白二十九首，杜甫三十九首；中唐时的韦应物十二首，刘长卿十一首；晚唐时的杜牧十首，李商隐二十四首。初唐时在诗歌发展上有过贡献的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杜审言、陈子昂等的作品也选入了。盛唐时被称为“诗家夫子”的王昌龄选入八首，以七言歌行见长，“发调既新，修辞亦秀”（《河岳英灵集》）的李颀选入六首。其他像张九龄、贺知章、高适、崔颢、岑参、祖咏、张旭等，都有代表作品选入。中唐时的诗人除韦应物、刘长卿外，其他诗人入选的诗虽然不多，但面较宽，为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大致入选。晚唐除“小李、杜”而外，像许浑、马戴、韩偓、温庭筠、韦庄、杜荀鹤等名家都有作品选入（其中有缺陷，下面将要论及）。这是倡导性灵、神韵、格调等艺术观而偏于一隅的选本所不及的。

第六，入选诗篇较注重艺术性和诗味。诗歌作为语言艺术，必须有鲜明的形象，强烈的激情，优美的意境，浓郁的诗味，才能“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”（《诗品序》）。在孙洙选编《唐诗三百首》之时，正是王渔洋的神韵说、沈德潜的格调说、袁子才的性灵说风靡一时之世，他博采众长，荟萃其美，甄选唐诗。所以，入选的诗篇，既有比兴言志，情致宛转的佳作，如张九龄的《感遇》；也有想象奇绝，扣人心弦的名篇，如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；还有描绘边塞奇丽风光，雄伟壮阔的篇章，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、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；也还有感情深沉，忧国伤时的名作，如杜甫的《春望》、《登岳阳楼》；还有诗中有画，给人美感的诗篇，如王维的《终南山》、《过香积寺》；也还有叙事生动，曲尽其妙的长篇巨制，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、《长恨歌》；更还有深曲隐晦，但有一种朦胧之美的作品，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。还有众多



的好诗，不能遍举。正由于孙洙在选诗时不拘于某一家的标准，独具只眼，重艺术、重诗味，因而使《唐诗三百首》两百多年来拥有广大读者。

但是，《唐诗三百首》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选本，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局限，所以存在几个明显的缺点。最突出的是对杜甫、李绅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皮日休、杜荀鹤、聂夷中、曹邴等现实主义诗人反映人民疾苦，抨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作品一篇不选，这显然是孙洙信奉儒家“温柔敦厚”诗教的结果。与此相连，选入了几首宣扬封建妇道的作品，如韦应物的《送杨氏女》，孟郊的《烈女操》等。此外，一些奉和应制之作，虽然艺术上有可借鉴之处，但思想内容并不可取。这类诗篇的选入，不过是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罢了。

这个唐诗选本虽有缺点，但瑕不掩瑜，在今天仍能适应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的需要，大部分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，也还值得吸取或借鉴。就是说，在建设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事业中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仍有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为此，我们重新加以注释，并对每首诗作了较详细的分析，指出其艺术上的成就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阅读、欣赏。同时对七十七位诗人，写了较详的小传，扼要叙述其生平与创作情况，以及艺术特色。

本书以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的“四藤吟社”本为底本，再用《全唐诗》和一些诗人的专集作参校，改正了一些错字。五言古诗、五言乐府、七言律诗、七言乐府、七言绝句及乐府由王启兴注释、评析；七言古诗、七言乐府、五言律诗、五言乐府、五言绝句及乐府，由毛治中注释、评析。限于水平，疏漏和错误之处肯定会有，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王启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武昌珞珈山

衡塘退士

原序

世俗儿童就学，即授《千家诗》，取其易于成诵，故流传不废。但其诗随手掇拾，工拙莫辨，且止五七律绝二体，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，殊乖体制。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，择其尤要者，每体得数十首，共三百余首，录成一编，为家塾课本，俾童而习之，白首亦莫能废，较《千家诗》不远胜耶？谚云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请以是编验之。